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s

東亞視野下的宋代文學史料研究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鞏本棟  
GONG Bendong<sup>\*</sup>

---

\*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在中國歷史上，漢語言文化曾對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產生過重要影響。以漢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典籍，也從各種管道傳入這些國家，而以宋代以後為著。宋集傳至域外後，又多經翻刻，而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原集在中土散失，僅靠朝鮮本或和刻本傳世的，也不在少數。此外，由域外士人編纂和撰寫的各種宋人詩文的選本、注本和詩話以及文集、史傳、筆記等文獻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學史料。

宋代文學研究的史料，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國內現在還保存著的宋代和宋代以後的各種典籍中。然而在域外，主要是在韓國和日本等東亞、東南亞國家所保存的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和這些宋集與撰述的朝鮮本、和刻本以及域外士人所編撰的宋集的注本、選本和詩話、文集、史傳、筆記等許多文獻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學研究的材料。

## 壹、宋人別集與總集

在中國歷史上，以漢語言文字為主要載體的漢文化曾對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產生過重要影響。漢籍之傳入周邊國家，由來已久。即如漢籍在朝鮮半島的傳播，雖然西周時期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因而也將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書帶到朝鮮的說法，現在已不可考實，但其國向慕漢風，文物制度，悉尊中土，又「俗愛書籍」，<sup>1</sup>至少自秦漢以後，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典籍以及史部、集部的許多著作，已逐漸傳入東國，並產生重要影響，是完全可信的。據朝鮮時期李種微《東史志·高句麗藝文志》的記載，當時「閭巷里落，莫不有學。其學士大夫日遊學于中國，而中國書籍已與之日東。而魏晉之間，歷代賜書，又復相繼而至，秘府所積，蓋亦多矣」。<sup>2</sup>至新羅神文王二（682）年立國學，在所規定的諸生所讀的書中，就

---

1 〔後晉〕劉昫：《舊唐書·高麗傳》，第199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2 〔朝鮮〕李種微：《東史志·高句麗藝文志》，《修山集》，第12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47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年）。

有《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孝經》、三史和《文選》等四部書中的許多基本典籍，<sup>3</sup>而這正可以反映出當時漢籍流傳和被接受的大致情況。宋代（高麗時代）以後，各種書籍從多種渠道大量傳入東國，並對其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就更是人們熟知的事實。

漢籍傳入日本的時代也比較早，「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sup>4</sup>雖只是一種傳聞，但到飛鳥奈良時代尤其是平安朝以後，漢籍東傳日本的數量已相當可觀，僅據九世紀後期藤原佐世所撰《本朝見在書目錄》的記載，當時傳入的各種漢籍的總數就已超過一千五百種（尚不包括佛教典籍），五山時期經由僧侶攜帶或其他渠道進入日本的漢籍則更多，進而也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直至今日，仍有很多漢籍保存在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家，就中宋人別集、總集和其他有關的宋代文學文獻，亦相當之多，不應忽略。

現存域外的宋人別集、總集善本的數量，見於各種書目著錄的，韓國在百種以上，<sup>5</sup>日本則有二百五十種左右，<sup>6</sup>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這些別集和總集中，不乏僅存於域外的孤本、珍本。像南宋紹興十九（1149）年明州公庫重刊本和影鈔明州本徐鉉《徐公文集》三十卷，就僅見於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和靜嘉堂文庫，而國內只有明清以來出於明州本的鈔本、刊本。<sup>7</sup>歐陽修的詩文，由其子歐陽發在其身後彙編成集，至南宋光宗紹熙、甯宗慶元年間，

3 參見〔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職官志》，第32卷上（首爾：景仁文化社，1977年）。

4 〔宋〕司馬光：〈和君倚日本刀歌〉，《全宋詩》，第49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此詩又作歐陽修詩，題作《日本刀歌》（《全宋詩》，第299卷亦收入，無校語），這裏從王水照所考；見王水照：〈《日本刀歌》與漢籍回流〉，《半肖居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

5 參見鞏本棟：《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收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6 此據嚴紹溥：《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沉》（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一書所收書目統計。

7 參見嚴紹溥：《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沉》，頁3。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周必大、孫謙益等人重新校訂，刊刻行世，成《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此本在中國國內沒有完書，但在日本天理圖書館卻完整地保存著。<sup>8</sup>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南宋乾道初沈公雅編刻，宋本久佚，國內僅存慶元本正集殘帙三卷、《外集》三卷，而乾道本正集卻完整地收藏在日本內閣文庫，一九三〇年張元濟先生影印入《四部叢刊續編》中。傅堯俞《草堂集》一卷、《傅獻簡公奏議》四卷，僅存于東京大學圖書館。<sup>9</sup>南宋刊本崔敦詩《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明中期以後中土失傳，也僅存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日本光格天皇文化四（嘉慶十二，1807）年由天瀑山人林衡刊入《佚存叢書》之後，始傳回我國。<sup>10</sup>再像宋刊一百一十六卷本《增廣司馬溫公全集》，中土久佚，而在日本內閣文庫卻保留了其中的九十五卷。董康《書舶庸譚》卷八曾作著錄，傅增湘先生《藏園東遊別錄·日本內閣文庫訪書記》也有簡要的記載。是書與《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及《傅家集》在編次、收文數量上皆有不同，其中的《日錄》、《手錄》為海內外僅存，另有詩詞十首、文五十六篇，亦僅見於此書。由於此書原出司馬氏後人，故校勘價值也很高。<sup>11</sup>其他像南宋釋居簡的《北磻詩集》九卷，也僅存於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則有朝鮮刊本殘一至四卷）。其《北磻文集》十卷，今北京國家圖書館存宋本一至八卷，日本存卷七至卷十，合之可成完璧。杜范《杜清獻公集》二十卷，今存嘉靖二十六（1547）年黃氏刻本，僅存於日本，《靜嘉堂秘笈志》卷三十七著錄，為善本，明清鈔本出此。

別集如此，總集也不例外。如宋刊本《二李唱和集》一卷，中土已佚，清末陳槃、羅振玉先後得自日本書肆，亟攜歸刊印，國內始傳此書。再如，

---

8 參見嚴紹溥：《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30-331；《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51-353。

9 參見沈治宏（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10 參見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第6卷，收於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二輯》（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

11 李裕民於一九九二年首先發現此書中收有《日錄》和《手錄》，並撰文介紹此書價值，其後又撰《司馬光日記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一九九三年，日本汲古書院將全書影印出版。

近年由韓國學者金文京先生發現的、宋人孔汝霖編集、蕭澥校正的宋詩總集《中興禪林風月集》三卷（藏于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也是一部中土久佚的書。是書收錄了南北宋詩僧六十三家的五七言絕句九十九首，其中肆十六家六十首詩為佚詩，其他可供瞭解宋釋事蹟、進行詩歌校勘的材料也很多，有重要的文獻價值。<sup>12</sup>

從宋集之存世而言，域外所保存的本子在數量上畢竟不能算是太多，其中保存在日本等國家的很多宋集刊本，中土也並非全然不存，但其中仍有不少可補、可校中土本之不足者。如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中土有明本，而日本內野五郎則藏有南宋嘉定重修紹興宣州軍學本，雖只是殘存三十卷（存卷13-18、37-60），然誠如傅增湘先生所指出的，「取明刻校之，文字異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詩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東軒筆錄》所記之《書竄》詩，乃赫然具在。〔……〕是此書亦宋代求法僧徒所攜歸，故卷中絕無吾國名家藏印，真海外之佚籍也。」<sup>13</sup>再如宋刊本《東坡集》、《東坡後集》，現存皆殘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南宋孝宗時刊大字本《東坡集》殘三十卷（存卷1至24、卷33、卷35-39，其中卷3據明本抄補，其餘卷帙亦有缺頁），而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卻保存了《東坡集》三十七卷（存卷1-33、37-40）、《東坡後集》八卷（存卷1-8），內閣文庫還存有另一宋本《東坡集》二十三卷（存卷1-2、7-10、13-14、19-20、24-27、31-35、38-40）。三本相互補訂參證，即可復原宋本《東坡集》全貌。<sup>14</sup>還比如，秦觀《淮海集》四十

12 參見張如安、傅璇琮：〈日藏稀見漢籍《中興禪林風月集》及其文獻價值〉，《文獻》，2004年第4期（2004年）。據朱剛先生見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較龍谷大學所藏為佳。蓬左文庫則藏有是書的注本《中興禪林風月抄》，在日本已經出版，亦較龍谷大學本為佳。另外還有收作品更多的禪僧詩集，曰《江湖風月集》，日本東洋文庫有五山版白文本，內閣文庫與蓬左文庫則有其注本，也已在日本影印出版。

13 傅增湘：〈宋本宛陵先生文集跋〉，《藏園群書題記》，第1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點夏敬觀先生亦曾指出，參見夏敬觀：《梅堯臣集校注·序》（未出版），附載於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4 南宋孝宗大字本《東坡集》的文獻價值，潘宗周在《寶禮堂宋本書錄》中曾予以指出，他說：「端甸齋近覆成化本，繆藝風據錢求赤校宋本及嘉靖刊本為之校訂，至為詳慎。但參以是本，有足以正其訛奪者。」因列舉十七例以說明（如卷十二《寒食雨》其二「空庖煮寒菜」，成化本、繆校本「空」誤作「寒」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和倉田淳之助曾將日本宮內廳和內閣文庫所存兩本拼合，抽印《東坡集》中詩十八卷（卷1-18）、《東坡後集》詩七卷（卷1-7），編入《蘇詩佚注》（京都：同朋舍，1965年）。

卷、《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淮海後集》六卷，日本內閣文庫尚存南宋乾道九（1173）年高郵軍學刻本，而國內則惟有重修乾道本，後序及原刻本題識都已脫去，正賴前者得以補全。洪咨夔《平齋文集》三十二卷，亦僅藏于日本內閣文庫，國內有瞿鏞鐵琴銅劍樓影宋鈔本，缺卷十一至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二，計八卷，近人張元濟赴日本訪書，借影攜歸，與瞿本合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遂成完璧。其他如宋祁《宋景文集》全帙自明末在中土已不傳，清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時，自《永樂大典》中輯得六十二卷，已頗為可觀。然在日本帝室圖書寮和宮內廳書陵部所保存的宋本《宋景文集》殘帙三十二卷，較之《四庫》本，仍多出律詩二百二十首、表狀四十五首、序九首、說錄題述四首、論一首、雜文等十九首、啟狀一百四十五首，計八萬餘字。而其餘與《四庫》本內容相重合的部份，也有校勘價值。<sup>15</sup>是書由林衡刊入《佚存叢書》後傳入中國，清孫星華輯《宋景文集拾遺》、近人編《湖北先正遺書》、《叢書集成》等，都將其補入，現已頗為易得。還有《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國內僅有按人編排的七十卷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則存分類編纂的南宋初年刊百卷本，這不但可資校勘，而且對後人進一步瞭解南宋初年三蘇文盛行的情況，也是有幫助的。<sup>16</sup>其他像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及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等處的大量的宋集的明刻、明鈔本，也都有較高的文獻價值。<sup>17</sup>

---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曾加以利用。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亦收入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東坡集》、《東坡後集》。

15 參見何忠禮：〈從〈景文宋公集〉殘本到〈三場文選綱目〉全帙〉，收於王勇（主編）《中日漢籍交流史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

16 今此書已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二輯》。

17 詳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沈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田濤（主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等。

## 貳、宋集之朝鮮本與和刻本

宋集在域外的保存和流傳，更多地是以各種翻刻本的形式進行的。

在東國高麗時期，較大規模地翻刻漢籍，始於顯宗、高宗時期的翻刻《大藏經》。靖宗八年，東京留守崔顛等奉詔刊刻兩《漢書》、《唐書》，十一年四月秘書省刊刻《禮記正義》、《毛詩正義》。<sup>18</sup>文宗十年八月，因西京留守上書，命刊印「秘閣所藏《九經》、《漢〔書〕》、《晉〔書〕》、《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醫、蔔、地理、律、算諸書」。宣宗時，又詔「于興王寺真教藏都監，購書于遼、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sup>19</sup>至朝鮮太宗時期，活字印刷術逐漸興盛，王廷多次下令鑄金屬活字，刊印圖書，頒佈中外。如朝鮮中宗十四（明武宗正德十四，1519）年，中宗就「命依中朝例，設書肆，以昭格署鑰器及破寺鑰鐘等物鑄字印書冊，令不拘公私興造。」<sup>20</sup>從現存的十餘種朝鮮時期的《冊板目錄》來看，當時八道公私所刊冊板中絕大多數為從中國傳入的典籍。由此可見麗、鮮兩朝漢籍刊刻事業的興盛。

宋集刊刻的興盛，在高麗後期至朝鮮初期。其時文壇尚宋人詩文，<sup>21</sup>像當日「盛行於東方」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集，<sup>22</sup>都曾先後刊印過。其中如王安石的文集，高麗朝已傳入，李奎報《王文公菊詩議》曾論及王安石詩。<sup>23</sup>朝鮮徐居正詩《讀王荊公集題後》，<sup>24</sup>崔淑精《秋夜讀〈王

18 參見〔朝鮮〕鄭麟趾等：《高麗史》，第6-7卷（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

19 〔朝鮮〕金致仁等（修）：《藝文考·一》，李萬運（續補）、高宗朝弘文館（纂輯校正）《增補文獻備考》，第242卷（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年）。

20 前揭書。

21 如〔高麗〕林椿就說：「本朝製作之體，與皇宋為甲乙。」（〈與皇甫若水書〉，《西河集》，第4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

22 〔朝鮮〕申叔舟云：「宛陵梅先生生盛宋，與歐、王、蘇、黃，並驅一時，詩聲最著。而歐陽諸子諸集，盛行於東方。」（〈宛陵梅先生詩選序〉，《保閑齋集》，第15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

23 〔宋〕王安石：《東國李相國文集》後集，第1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

24 見〔朝鮮〕徐居正：《四佳集·詩集》，第2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

荊公集》》，<sup>25</sup>李苻《容齋集》卷一《書〈王荊公詩集〉贈子真》詩，<sup>26</sup>也都提到《王荊公集》。而據《增補文獻備考》卷二四二《藝文考》一所載：「〔朝鮮〕成宗二年，用王荊公、歐陽公集字鑄之，字體小於庚子字而尤精，名曰辛卯字。」知成宗二（明憲宗成化七，1471）年前就曾印過《王荊公集》和《歐陽文忠公集》。又檢《成宗實錄》卷一七四成宗十六年正月乙酉載，成宗有「今以甲辰字將印《唐書》，然先可印《王荊公集》」云云，則成宗十六年又下令印過《王荊公集》。今韓國奎章閣即有成宗時甲辰字殘本《王荊文公集》三冊（存卷5至39、卷50的一部分，白文無注）。王安石詩李壁注劉辰翁評點的本子，朝鮮時期也曾刊印過。今《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總目錄》和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古書目錄》都著錄有甲寅字殘本李注劉評的《王荊文公詩》，奎章閣存兩卷（卷5、6），延世大存八卷（卷9-11、37-39、40、41），日本蓬左文庫則存有全本，王水照先生在日本曾訪得此書並引回國內，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是書的珍貴之處是較通行本《王荊文公詩注》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補注」和「庚寅增注」，相當完整地保存了李注本的全貌，而此書全本在中土則早已失傳，<sup>27</sup>僅賴此朝鮮活字本以存，其對研究王安石詩歌和宋代文學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sup>28</sup>再如魏齊賢、葉棻所編的《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朝鮮時期也曾刊印過，今存朝鮮世宗五（明成祖永樂二十一，1423）年刊本和中宗朝乙亥（1455）字本。<sup>29</sup>乙亥字本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分別藏有殘本（前者存一冊，未詳卷數；後者存一至四卷）。因此書所據當為宋本，故今中國國家圖書館雖仍存宋本，此書仍有一定的校勘價值。

集叢刊》，第1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

- 25 〔朝鮮〕崔淑精：《逍遙齋集》，第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3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88年）。
- 26 〔朝鮮〕李苻：《容齋集》，第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88年）。
- 27 元大德本《王荊公詩李壁注》保存有少量補注和庚寅增注。又，一九九二年，臺灣故宮博物院新得《王荊公詩》李注的殘本十七卷，昌彼得等曾撰文介紹，筆者亦有幸得見此書，知有可補朝鮮本之闕者。
- 28 參見王水照：〈《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前言〉，收於〔宋〕王安石《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29 據韓國尹炳泰所編《韓國古書年表資料》，此書除乙亥字本外，尚有朝鮮世宗五年（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1423）刊本。



漢籍和刻本的發端當是從佛經的刊刻開始的，大約從十三世紀開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的翻刻日益增多，尤其是五山和江戶時期，各種和刻本漢籍更是大量出現。宋集的翻刻自然也隨之大為增加。其中不乏中土已佚而僅賴和刻本以存的宋集。如，宋釋元肇的《淮海掣音》二卷《淮海外集》二卷，中土久已失傳，而日本卻保留著東山天皇元祿八（康熙三十四，1695）年神洛書林柳枝軒據宋本翻刻的本子和中御門天皇寬永七（康熙四十年，1710）年的木活字本。<sup>30</sup>釋善珍的《藏叟摘稿》二卷，國內久佚，日本內閣文庫卻藏有寬文十二（1672）年藤田六兵衛刻本。釋寶曇《橘洲文集》十卷，現在僅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宋鈔本殘四卷（7-10），然日本東山天皇元祿十一（康熙三十七，1698）年織天重兵衛仿宋刻本十卷，卻完整地保存在日本內閣文庫。<sup>31</sup>其他如南宋初釋惠空的《雪峰空和尚外集》等，也是以有和刻本而獨存的。

有的朝鮮本與和刻本宋集，雖中土亦存，但同樣有重要的板本和校勘價值。比如《真山民詩集》一卷，《四庫全書》據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收錄，計詩歌一百零八首，而日本光裕天皇文化九（1812）年西宮彌兵衛重刊元大德本，則比《四庫》本所收多出五十一首。又如，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先生所編《和刻本漢詩集成》中所收宋詩諸集，內有日本靈元天皇貞享三（1686）年京都柳枝軒茨木多左衛刊兩卷本《和靖先生詩集》，此本出北宋林大年原編本，與南宋本和明人輯四卷本編次不同，所收作品也有參差，極可珍重。又，日本後水尾天皇寬永六（崇禎二，1629）年京都大和田意閑刊本《山谷詩〔內〕集注》二十卷，原自宋本翻刻，文字多優於明清諸本，楊守敬曾自日本攜歸一套，清光緒年間陳三立據之重刊（光緒二十一年開雕，二十五年刊成），流傳較為廣泛。今中華書局版《黃庭堅詩集注》，其內集即以此為底本（外集和別集則以楊守敬所藏、陳三立重刊朝鮮古活字本為底本）。還有《和刻本漢詩集成》中的《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原自朝鮮本翻刻，近人李盛鐸曾將其與丁丙藏黃虞稷千頃堂鈔本等對校，指出

30 參見李國慶、季秋華：〈《淮海掣音》述略〉，《中國館藏日本版古籍書目通訊》，第12號（1992年）。天津圖書館、大連圖書館藏有日本大正二年（1913）成篋堂影印元祿本。

31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亦藏有此本。

其「字句之間，則瞿氏《書目》所列宋刊胡穉箋注本佳處，此本與之悉合，丁本之誤與官刻不相上下也。則此須溪評點本源出宋刊本無疑，且箋注雖不全，所存者胡注必不少。瞿氏所藏乃宋槧孤本，得此亦仿佛虎賁中郎將矣」。<sup>32</sup>可見其價值之大。其他如《後山詩注》十二卷（日東山天皇元祿三年京都茨木多左衛門刊本）等，亦足資校勘。

### 參、宋集之選本和注本

宋集在域外的廣泛流傳，選本、注本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這些選本和注本的水準也許有高下參差，但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評價宋代的許多作家和作品，仍有積極的意義。

在朝鮮半島，中國詩文選本、注本的編纂始於高麗時期。現在仍保存在韓國奎章閣的《十抄詩》，便是以劉禹錫、白居易等中晚唐詩人為主要收錄對象的一部唐詩選。<sup>33</sup>高麗後期的金九容取法於蕭統《文選》和姚炫《唐文粹》，也編過一部詩文選集名《選粹集》。<sup>34</sup>麗末朝鮮初，宋人撰述尤其是宋人所編的宋人詩文選本，如《宋賢集》、《宋文鑒》、《瀛奎律髓》等，在東國廣泛流行。受其影響，由東人所編纂的各種詩文選本也就不斷湧現。比如朝鮮初期，安平大君李瑢就編有多種宋詩選本。其中，「選集李、杜、韋、柳、歐、王、蘇、黃之詩，名曰《八家詩選》（十卷，其中唐人尚占四家）」，或以為可「泝黃、蘇之流，登李、杜之壇，以入於《雅》、《頌》之堂」；<sup>35</sup>選注《宛陵梅先生詩選》二卷，稱其詩「簡古精純，平淡深邃，寄興托比，自與唐人無校，則獨聖俞一人而已」；<sup>36</sup>又選王安石詩，「以天地人

32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張玉範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33 《十抄詩》也收錄了新羅時期崔致遠、朴仁范、崔承佑、崔匡裕四位元詩人的作品。

34 參見〔朝鮮〕金侏（編）：《海東文獻總錄》，「中國詩文撰述」類（首爾：學文閣，1969年）。《選粹集》今不存，具體所選之人與作品已不詳。

35 〔朝鮮〕朴彭年：〈八家詩選序〉，《朴先生遺稿》，第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88年）。

36 〔朝鮮〕申叔舟：〈宛陵梅先生詩選序〉引安平大君手劄。據李仁榮《清芬室書目》卷

三才分門類集，略加注解」，<sup>37</sup>成《半山精華》六卷，人稱「富不失泛，簡不失略，取捨精當，門類有節。綱舉目張，條理不紊」；<sup>38</sup>複「取山谷詩短章之佳者，粹而匯之，就加評論，名曰《山谷精粹》」。<sup>39</sup>這些詩選的編纂，雖都是崇尚宋詩風氣下的產物，但顯然又有其對宋詩的認識和理解，那就是較能顧及宋詩的總體，而並不只是尊崇蘇軾一人。<sup>40</sup>其後，柳希齡編《祖宗詩律》十四卷，奉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為宗旨，而又加以擴大，收入蘇舜欽、陸游、朱熹、周尹潛等人詩作。<sup>41</sup>編《宋詩正韻》（現僅存卷4-6三卷），也以收錄江西詩派詩人的作品為主。<sup>42</sup>然此書多收古體，似有意與《祖宗詩律》相區別；又增入蘇轍、張耒等人，是亦擴大到了蘇門（柳氏另編有《蘇詩抄》二卷，收錄蘇軾詩九十二首，分類編排）。<sup>43</sup>顯然，與李榕相比較，柳希齡更多地受到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詩學觀念的影響，對江西詩派極為推崇。不過，他對作品的選擇，也尚未完全囿於江西詩派，而是仍試圖依據自己的理解，較全面地來反映宋詩發展的面貌。

二，是選有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全羅道錦山郡刊本，今存日本蓬左文庫。又，安平大君此論似也受到麗末著名詩人李奎報的影響，參〔高麗〕李奎報：〈論詩說〉，《東國李相國集》，第2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

- 37 〔朝鮮〕金傑（編）：〈半山精華提要〉，《海東文獻總錄》，「中國詩文撰述」類。
- 38 〔朝鮮〕申叔舟（編）：〈半山精華·序〉，《海東文獻總錄》；是書著錄於〔朝鮮〕李仁榮：《清芬室書目》，第2卷（有〔韓〕寶蓮閣影印本），今日本成篋堂存正統年間朝鮮刊本。
- 39 〔朝鮮〕崔恒：〈山谷精粹序〉，《太虛亭文集》，第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88年）。
- 40 麗末尚東坡，如徐居正曰：「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參見〔高麗〕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上，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至朝鮮時期，各種東坡詩文選本層出不窮，如鄭百朋編《東坡詩選》、佚名《蘇文抄》、《霞選施注蘇詩》、金希參《蘇文正宗》、朴宗熏《文史咀英》（選歐陽修、蘇軾兩家文）等。其中較好的是鄭百朋的《東坡詩選》和朴宗熏的《文史咀英》。
- 41 此書編成于朝鮮中宗二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尚存全帙（參《清芬室書目》卷五）。今止存柳氏後人藏殘本五卷（卷9-14）（參黃渭周：〈關於韓國編纂的中國詩選集的研究〉，收於趙敏俐（主編）《中國詩歌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42 據黃渭周：〈關於韓國編纂的中國詩選集的研究〉，此書約編于朝鮮中宗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以年代先後為序，殘卷現存韓國普州柳氏文貞公派宗親會。
- 43 據黃渭周：〈關於韓國編纂的中國詩選集的研究〉，是書編于中宗二十五年（1526），現存柳氏後人柳哲馨處。

高麗後期，理學逐漸傳入東國，至朝鮮世宗、中宗以降，更是大倡儒學，推崇朱熹，理學成為一代官學，《朱子大全》等理學家的著作一再刊行，朱熹詩文的各種選本，也層出不窮。如朝鮮正祖就曾編定過《紫陽子會英》三卷、《朱子選統》三卷、《朱書百選》六卷、《朱子書節略》二十卷、《朱子會選》四十八卷、《雅誦》八卷等多種朱熹詩文選本。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朱熹書筭的編選。朱書的編選，始於朝鮮時期著名的朱子學者李滉編《朱子書節要》十四卷，是書的編選雖以「尤關於學問而切於受用」，「能使人感發而興起」者為宗旨，<sup>44</sup>多收朱熹論學、論事之作，但同時因所選書筭中，「或彼此往復之際，亦有道寒暄、敘情素，玩水遊山，傷時問俗等閒酬似不切之語，間取而兼存之，使玩而味之者，如親見先生於燕閑優逸之際，聆音旨於警談笑之餘，則其得有道者氣象於風範神采之間者，未必不更深於專務精深不屑不緊者之德孤而無得也」，<sup>45</sup>所以亦可視為一文學性選本。是書影響很大。「東人之尊崇朱書，實權輿於是書」。<sup>46</sup>此後鄭經世編《朱文酌海》十六卷，於書、封事外，諸體兼收，意在補《朱書節要》之不足。正祖御定《朱書百選》六卷，也是《朱書節要》的擴大。又，宋時烈編《朱文抄選》，仍以書筭為主，又加上了批語。書筭一體，原本用途廣泛，然在魏晉以後的發展中，卻以親朋故舊之間的往來書筭最堪注目。其文體則「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懣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百封各意」，「親疏得宜」。<sup>47</sup>較少官樣文章，多能見人性情。至宋人不僅以書筭通消息、問動靜、論時事、敘親情，更切磋學問，往復論難，動輒十數番。因此，朝鮮時代的士人選擇相對親切易讀的書筭，去體貼學問，修道明德，變化性情，不但角度獨特，也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書筭這一文體的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至於像《朱文酌海》等書，兼收序跋、記和各種雜著述等文學性的文體，不用說更是可以提供我們文學研究的參考的。

44 〔朝鮮〕李滉（編）：《朱子書節要·序》（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全州重刊本，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藏）。

45 〔朝鮮〕李滉：《答李仲久書》（全州重刊本）。

46 〔朝鮮〕徐有榘：《鏤板考》卷六《朱子文集提要》，《韓國冊板目錄》卷下，〔韓〕保景文化社，1995年）。

47 〔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詹鍇義證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理學成為官學，理學家的詩文和他們所編的詩文選本，在朝鮮時代也非常流行。像邵雍、程顥、程頤、張栻、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集，以及呂祖謙所編《古文關鍵》、樓昉編《崇古文訣》、真德秀編《文章正宗》、金履祥編《濂洛風雅》等，都曾被多次刊刻。理學家的詩歌，尤其是朱熹的詩，甚而成了朝鮮時代朝野上下士人修業進德的途徑之一，以至有人認為：「由今之時，造今之士，莫如學夫子之詩而咸有所得，於詠歎謠液之際，消融渣滓，動盪血脈，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而非僻惰慢之志無以作。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可以興於斯，可以觀於斯，可以群於斯，而先王之詩教庶幾窺其萬一。」<sup>48</sup>於是，應此需求，東人所編的理學詩選也大為增加。如正祖所編朱子理學詩選《雅誦》八卷，收朱熹古近體詩三百五十九首，其中《遠遊》、《武夷棹歌十首》、《齋居感興》、《武夷精舍雜詠》、《鵝湖寺和陸子壽》、《寫真》等作品，都是影響極為廣泛的理學詩歌。<sup>49</sup>更有甚者，由推崇朱熹，進而連帶著也推崇朱熹所讚賞的詩人。如陸游，朱熹曾稱其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sup>50</sup>而朱熹是亞聖，「於人物臧否，一言重於九鼎」，所以，正祖便認為，「當今之時，等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舍杜〔杜甫，朱熹曾稱之〕、陸奚以哉」？<sup>51</sup>於是親選《杜陸千選》八卷（杜甫、陸游五七言律詩各四卷），從陸詩中選錄了不少「慨六飛之南渡，恨二轅之北狩，起聞江聲瀕洞，傑然有鐵衣東征之想」的作品。其實，對理學詩的推崇，並不限於東國，如日人梅室雲洞就認為，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作詩固然是妙手，然程顥、邵雍、朱熹等人的詩也是自道德仁義中流出，有天然格法，理應兼收並蓄。<sup>52</sup>理學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曾被指斥為理障、非詩，甚而被批評為：「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宋人主理，作理語。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sup>53</sup>然而，詩可以抒情、敘事，自然也可說理。作詩若得理趣，如水流雲

48 [朝鮮]正祖(編)：《雅誦·序》，延世大學校圖書館藏甲寅字本。

49 是書又選朱熹詞賦琴操四首，附銘箴贊題辭、三先生祠文、勸學文五十二首，諸選詩文有關臣簡注。

50 [宋]朱熹：〈答徐載叔賡書〉，《晦庵集》，第56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1 [朝鮮]正祖(編)：《杜陸千選·序》，延世大學校圖書館藏英陵朝甲寅字本。

52 參見梅室雲洞：《詩律初學鈔》。

53 [明]李夢陽：《岳音序》，《空同子集》，第52卷，《四庫全書》本。

在，月到風來，同樣是好詩，在文學史上理應占一席之地。朝鮮時期，理學詩盛行，對東國詩歌的發展有重要影響，作為漢語言文學的一部分，也不應置而弗論。而反觀迄今為止的各種文學通史或斷代文學史，大都不為理學詩立章節，顯然是不妥當的。

駢體文興盛於唐而發展於宋，史稱「宋四六」。自中唐以來，散文已顯示了它的創作實績，在許多方面已代替了駢文。但在實際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如政府公文、科舉考試和書啟往來等方面，卻仍依舊制。很多以古文名家的士人，同時又是四六文的高手。駢文以其較強的實用性和吸收古文的長處而得到發展並保持著自己的地位。宋四六傳至域外尤其是東國以後，也被廣泛的運用於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各種四六文選本亦應運而生。如朝鮮中宗時期，趙仁奎就編有《儷文編類》二十卷。是書為編纂年代較早的一部大型的宋四六選集，編選目的是實用。趙仁奎認為，四六文用途廣泛，「凡君臣上下，朋友之交際，冠昏喪祭之情文，莫不用焉」，遂「各以類分，編藏箱篋」，<sup>54</sup>每類又大致以作者年代先後為序，所選則多為名家名篇。仁祖時，李植在此書的基礎上，又編成《儷文程選》十卷，<sup>55</sup>也是以類編排，然或是出於學習的目的，作品雖以宋四六為主，但又雜有少量六朝和唐代的作品；又由於李植所據以選文的底本是《儷文編類》和《八代四六全書》，所以每一類中文的編排順序也較混亂。其後，宋四六選本中較重要的還有金錫胄編《儷文抄》二卷、柳近編《儷文注釋》十卷、金鎮圭編《儷文集成》十八卷（另有《儷文集成前編》六卷，專收六朝和唐人駢文）等。其中以《儷文集成》最有價值，雖然其編選宗旨和目的仍與其他選本一樣在於學習和實用，但他認為，四六文的創作應「本之廬陵、眉山以厚其質而鬯其氣，參之以浮溪之精深，西山之婉曲，後村之色澤，梅亭之剪裁，而又旁通諸家，並取其長，〔……〕是不但場屋程文之可盡美，大而播告之言，小而敷奏之辭，皆

54 〔朝鮮〕趙仁奎（編）：《儷語編類·序》，見該書卷首，延世大學校圖書館藏甲辰字本。

55 據〔朝鮮〕鄭德餘：〈序〉，〔朝鮮〕李植《儷文程選》，李子時、鄭德餘等皆參與編事；見〔朝鮮〕趙緯韓：《玄谷先生文集》，第2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9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

將得其體、適其用，以致鬱鬱之休，此於聖世文明之治，亦不無所補爾。」<sup>56</sup>故所選也能既突出大家名家的地位，又照顧到一般的作家；既有文體選擇上的側重（如選表啟尤多），又兼顧到文體的涵蓋面，從而較全面地反映了宋四六創作和發展的實際。

在日本，中國詩文注本、選本的編撰，當源於飛鳥奈良時代（538-794）的漢籍抄寫。平安時代（794-1192）初期，淳和天皇朝茲野貞主編纂大型類書《秘府略》一千卷，已大量引錄漢籍文獻。<sup>57</sup>平安朝後期，宋人著述開始輸入日本（如《太平御覽》、《楊文公談苑》等）。鎌倉時代（1192-1338），宋人著述的傳入就更多，宋學被廣泛接受。至室町時代（1338-1603），宋學的影響達到高峰，尤其是五山僧徒訓釋朱子《四書集注》，抄寫翻刻、注釋講解《東坡詩集》、《山谷詩集》等，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成為時人學習揣摩的範本，各種講稿、注本和選本也就不斷湧現。其中最具有價值和代表性的，應屬太岳周崇所撰《翰苑遺芳》和笑雲清三所編的包括《翰苑遺芳》等多種蘇詩注本在內的《四河入海》以及萬里集九的《帳中香》。<sup>58</sup>

太岳周崇（1345-1423）是五山時期著名詩僧，師從義堂周信，博學多才，<sup>59</sup>精研《漢書》（有《漢書抄》，已佚），所注蘇詩二十五卷，名《翰苑遺芳》，萬里集九稱之曰：「《〔翰苑遺〕芳》、《脞〔說〕》、《〔續〕翠》（即《天馬玉津沫》）之三部，乃坡集之日月星也。凡好學者，而孰不借其餘光。」<sup>60</sup>可見其為人推重。是書的主要價值，在於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所撰之蘇詩佚注。現存的宋人注蘇詩，除零星所存的趙夔的注之外，以南宋初

56 [朝鮮]金鎮圭（編）：《儷文集成·序》，延世大學校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

57 是書據嚴紹盪說，殘存684、686二卷；參《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頁19-20。

58 《四河入海》與《帳中香》，日人稱為「抄物」。所謂「抄物」，大致即可認為是注本。然也有注而未備的意思在內。宋僧守千《上生經瑞應抄》（見《續藏經》）云：「疏是疏條為義，多分引文解義，然具次為門。抄乃漏略不備之義，多分臨時隨釋，而不及具備，故云漏略不備之稱。」（此點乃朱剛先生示知）

59 惟肖得岩禪師《太岳住天龍寺洞門疏》有曰：「非常舉得非常才，世有公論；第一流居第一位，人無間言。」見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2卷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60 萬里集九：〈《天下白》序〉，《梅花無盡藏》，第6卷，收於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2卷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年趙次公的蘇詩注為最早。其注不見於著錄，而南宋人多有論及，每稱其詳。<sup>61</sup>如樓鑰就說：「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奧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歎。」<sup>62</sup>林希逸《題徐少章〈和注後村百梅詩〉》亦云：「在昔聞人，有注前人詩者，有和前人詩者，未有且注且和者，獨趙次公於坡老為然。數十卷之詩，和盡而注，又特詳，此人所難能也。」<sup>63</sup>然趙次公注蘇詩原書在南宋以後即湮沒不聞，僅由《集注東坡先生詩》和《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所引而傳世，惜前者（即所謂蘇詩「五注」、「八注」、「十注」本）至今殘存不過四卷，後者於趙注又刪節過甚，趙次公注原貌已難窺見。南宋時又有施元之、顧禧、施宿合撰《注東坡詩》四十二卷，並附施宿所撰《東坡先生年譜》，陸遊為作序云：「司諫公〔指施元之〕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sup>64</sup>評價極高，後人殆無疑義。由於施宿身後遭誣論罷，家被抄籍，是書流傳亦不廣，直到清康熙年間宋犖得是書宋刊三十卷殘本，請邵長蘅等補注刊行，始得流行，然又以邵氏妄加刪改，不為世人所重。今宋本施注蘇詩散存於海內外，諸本拼合，仍缺六卷。<sup>65</sup>然而，在太岳周崇的《翰苑遺芳》中，卻保存了大量的在《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所未收的趙次公注，據日本學者倉田淳之助和小川環樹先生所輯，約有十萬字左右；今存宋殘本施、顧注蘇詩所缺的部

61 當然亦有駁正其說者，如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三「東坡用如泉事」等條。

62 樓鑰《簡齋詩箋敘》，見胡穉《增廣箋注陳簡齋詩》卷首。

63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第13卷，《四庫全書》本。

64 〔宋〕陸游：《施司諫注東坡詩·序》，《渭南文集》，第15卷，《四庫全書》本。

65 關於施注蘇詩的有關情況，學術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劉尚榮：〈宋刊施顧注蘇詩考〉，《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王水照：〈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3期（1983年）等，可以參考。然劉尚榮等所言現存施注蘇詩的卷數，每有參差。按〔宋〕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今存殘本四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刊本四卷一種（原繆荃孫所藏，包括卷11、12、25、26）；兩卷一種（原黃丕烈所藏，卷41、42）；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十九卷一種（原毛晉所藏，包括目錄下、卷3、4、7、10-13、15-20、29、32-34、37、38。據王民信（主編）：《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第六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3年）；翁同龢後人翁萬戈（現居美國紐約）所藏南宋鄭羽景定三年（1262）補刊嘉定本一種三十四卷（目錄2卷、卷3、4、11-18、21-42。據小川環樹、倉田淳之助（編）：《蘇詩佚注凡例》）；諸本拼合，尚缺六卷（卷1、2、5、6、8、9）。



份，大致可藉此復原。<sup>66</sup>另外，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中土久佚，由倉田淳之助首先在日本發現，公之於世。何掄《三蘇先生年譜》，全書已散失，僅見它書徵引，王水照先生曾從日本蓬左文庫所藏《東坡先生年譜》中輯得五千餘字。而太岳周崇在書中所引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又多可有補施、何二譜者。<sup>67</sup>由此皆可見《翰苑遺芳》一書的重要價值。

笑雲清三（1492-1520）所編的《四河入海》，包括瑞溪周鳳（1392-1473）的《坡詩脞說》、太岳周崇的《翰苑遺芳》、桃源瑞仙（1430-1489）所講一韓智翊抄記的《蕉雨餘滴》和萬里集九的《天下白》等四部蘇詩注本，故取江河淮濟四瀆入海之意，定名為《四河入海》。其實，書中還有笑雲清三自己的注解，並部份保存了江西龍派（1375-1446）的《天馬玉津沫》和惟尚得岩、嚴中周噩（二人均有蘇詩注本《東坡詩抄》，然原書不存）等其他「坡詩講談師」講習蘇詩的文字，應當說這實在是一部彙集了五山詩僧當日注釋、研習蘇軾詩歌最主要成果的集成式的注本和講稿。<sup>68</sup>由於它是諸僧研習蘇詩和教授生徒的記錄，所以較之一般注本要詳細得多。笑雲清三所選擇集注的蘇詩底本，是元刊劉辰翁評《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因注釋篇幅過大，每卷又析為四，全書已達百卷。集注的體例，是於每首詩下先羅列瑞溪周鳳等諸家之說，再附笑雲清三自己的看法。而諸家的注釋和講解，大致也如儒家經傳注疏，首釋全篇主旨，再說明作年，分段

66 今存〔宋〕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殘本四種拼合，雖缺六卷，然配上小川環樹、倉田淳之助自《翰苑遺芳》中輯出的施、顧注十卷（包括卷1、2、5-10、19、20，見其所編《蘇詩佚注》）和倉田淳之助發現的佚書施宿撰《東坡先生年譜》（王水照在日本蓬左文庫發現另一抄本，可與此參校），若能再將諸本相互比勘，校補訂正，則原書全貌大致已得。

67 詳參王水照：〈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2期（1986年）。

68 是書原亦有集成的編纂目的。笑雲清三談到此書編纂的緣起，曰：「一翁（指其師一韓智翊）之聽書者，竹處和尚（指桃源瑞仙）之口訣也（指竹處所講蘇詩，一韓抄其師說成《蕉雨餘滴》）。愚又受一翁口訣矣。翁一日告愚曰：『集以大成則可矣。』愚之抄之起本者，蓋翁遺意也。」見笑雲清三（編）：《四河入海·後記》，《抄物大系》（東京：勉誠社，1972年）。

注釋，講解大意。於詩中所涉人物、本事、地理方位和詞語典故等，詳加注解，徵引材料極為豐富。<sup>69</sup>

萬里集九（1428-?）所撰黃庭堅詩注《帳中香》二十卷、<sup>70</sup>序一卷，由其門人笑雲清三抄錄成書，日人尾崎雅嘉《群書一覽》卷五等著錄。是書注釋體例略同于《天下白》，而講說大意，分段注釋，更為詳盡，凡山谷詩中所涉人物、時事、典故等，皆備引經史子集和釋氏書注之。萬里集九曾自題其書後曰：「胡苕溪漁隱雲，陳履常有一聯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鑒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合，豈偶然耶。餘亦於《帳中香》而盡精力，猶如溫公、履常二公也，但玉石之區別，同日亦可語之乎哉。」<sup>71</sup>其所費心力之多，可以想見；其可資山谷詩研究之參考，亦毫無疑問。此外如一韓智翹的《山谷詩抄》、月舟的《山谷幻雲集》等，也是五山時期黃庭堅詩注本、選本的代表，此不贅述。

江戶時代（1603-1867）是日本思想文化發展很活躍的時期。此期雖然受明人影響，唐詩曾盛行一時，然朱子學在思想學術界仍占統治地位，至江戶後期，宋詩重又被推崇，各種宋人詩文的選本依然很多。其中，著名漢學家市河世寧（1749-1820）的《陸詩意注》（即《劍南詩醇意注》），較有價值。是書六卷，選陸遊各體詩歌五百二十五首，（其中七律較多，占三分之一），全書按寫作時間先後排列，有簡要注釋、解說和評論。其特點是多收錄陸詩中風格清新自然、平淡質樸的作品，可知曾受到清人的影響。<sup>72</sup>市河世

69 是書體例亦明顯受到宋人注唐集、注宋集的影響。如瑞溪周鳳自道其作《脞說》，「長篇分段，蓋擬趙次公杜詩之解也；題涉繁詞，則摘首尾兩三字而中間安止一字，蓋王伯大注韓集之例也；義有異論，則先舉諸說而至末判其優劣，蓋顏師古注《漢書》法也。」（《刻楮子瑞溪〈脞說〉敘》，收於笑雲清三（編）《四河入海》，《抄物大系》（東京：勉誠社，1972年）。

70 關於此書的取名，江介周鏡在序中說：「江左漆桶道人萬里，博涉群書，尚友古人，暇日把此集以『三傳』焉、『十翼』焉，仍名以『帳中香』。曰：『昔龍樹嗅《華嚴》而知其宗趣也，吾亦嗅此集而徹其奧也。』後來學者嗅之，必領其旨也，判然灼然。陸放翁氏所謂吾國以香為佛事云者，寔非虛發。是以名焉。」（《帳中香》卷首，東京圖書館藏活字本）

71 萬里集九：〈笑雲三公侍史所謄書《帳中香》跋〉，《梅花無盡藏》，第7卷，收於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2卷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72 參見郝潤華：〈陸遊詩歌與日本江戶文學——以市河寬齋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詩

甯還有《陸詩考實》、《陸遊年譜》和《三家〔楊萬里、范成大、陸遊〕妙絕》。大窪詩佛有《宋三大家絕句》。日僧廓門貫徹則有《注石門文字禪》三十卷。<sup>73</sup>其他如村瀨修石齋編選的《蘇東坡絕句》四卷、<sup>74</sup>赤松勳選注《東坡文鈔》二卷、<sup>75</sup>藤口信成編《宗忠簡文鈔》二卷、<sup>76</sup>賴襄山陽編選《李忠定公奏議選》一卷、《文選》一卷、《詩選》一卷、<sup>77</sup>桑原忱編《陸象山先生文鈔》三卷、<sup>78</sup>巽世大編《謝疊山文鈔》四卷、<sup>79</sup>《文文山文鈔》六卷、<sup>80</sup>如月編《中華若木抄》（收陸遊詩最多）以及日本文化五（1808）年大阪書肆重編吳之振《宋詩鈔·楊誠齋詩鈔》等，<sup>81</sup>均可使人窺知蘇軾、黃庭堅等人在域外的廣泛影響，也可為中國學者研究宋代文學提供新的參照。

與朝鮮半島和日本一樣，越南也是文獻之邦。從西元前三世紀初，漢籍就通過推行漢文化教育的方式傳入南越。<sup>82</sup>自八世紀以後，越南也一直實行著類似於中國本土的科舉取士制度，漢文化在越南曾得以廣泛的傳播並產生過深刻的影響。然而，越南漢籍的刊刻，卻遲至元代才出現，所刊刻書籍的範圍也主要限於經史典籍和科舉應制之文，今所見涉及宋代文學的選本比較少，且多為通代文學作品總集的抄本，編選者情況亦難詳。如《丹花上品》，編者不詳，雜收唐王勃、韓愈和宋代歐陽修、蘇軾、朱熹等人的詩文。《名墨抄撮》，編者亦不詳，以選收宋人趙普、王禹偁、蘇洵、蘇軾等

學》，第9期，（2004年）。

73 周裕鍇正在此書的基礎上撰寫新注。

74 〔宋〕蘇軾：《蘇東坡絕句》（文化十四（1817）年刊本），收於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第11冊（東京：古典研究會，1992年）。

75 〔宋〕蘇軾：《東坡文鈔》（文化元年（1804）東都山城屋佐兵衛等刊本）；參見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

76 〔宋〕宗澤：《宗忠簡文鈔》（文久元年（1861）抱月堂刊本）；參見前揭書。

77 〔宋〕李綱：《李忠定公奏議選》，賴襄山陽（編選）（嘉永六年（1853）活字本）；參見前揭書。

78 〔宋〕陸九淵：《陸象山先生文鈔》，桑原忱（編）（文久三年（1863）大阪群玉堂刊本）；參見前揭書。

79 〔宋〕謝枋得：《謝疊山文鈔》（弘化二年（1845）刊本）；參見前揭書。

80 〔宋〕文天祥：《文文山文鈔》（萬延元年（1860）刊本）；參見前揭書。

81 〔宋〕楊萬里：《楊誠齋詩鈔》；參見王綺珍：〈日文化戊辰刻本《楊誠齋詩鈔》述考〉，《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1991年）。

82 參見劉玉珺：〈中越書籍交流考述〉，《文獻》，2004年第4期（2004年）。

人的文章為主，其中收蘇軾文最多，另外也少量收有韓愈的文章。《宋史策略》、《宋史略》等，亦不著撰人，以收宋人策文為主，以供士人應舉之需。另有《樂府探珠》，題愛吾堂編選，收錄唐李白、劉禹錫和宋蘇軾、王安石、李清照、陸遊等人詞作三百九十篇，題下有簡單注釋。《歷朝詞選》，夏秉衡選編，選收唐代至清代的詞作，以雅淡為宗，按調編排。這些選集雖都不是專收宋人的作品，然藉此也可略見宋代文學在越南的流傳和影響。<sup>83</sup>

#### 肆、詩話及其它域外文獻中所見宋代文學史料

在域外漢籍中，不但保存了很多宋人詩文別集和總集以及宋集的朝鮮本、和刻本與各種注本和選本，而且還保存了不少宋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方面的其他文獻資料。

首先，域外保存了一些中土已佚的宋人詩話。《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即可作為例證。《唐宋分門名賢詩話》一名，不見於中外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唐宋詩話》，《宋史》卷二百零九《藝文志》八有《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皆不著撰人。郭紹虞先生根據它書稱引少有全稱的情況，推斷《遂初堂書目》等書所著錄的《唐宋詩話》與《唐宋分門名賢詩話》應為一書，<sup>84</sup>並進一步考證它產生的年代為北宋後期，「當為宋代匯輯詩話之最早者」。<sup>85</sup>在《宋詩話輯佚》下冊裏，還輯錄了此書的五條佚文。然郭先生或許不清楚，是書至少在明初以前就曾傳入朝鮮，且於成宗二十二（明

83 參見劉春銀等（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84 同門友張伯偉教授則認為，《古今詩話》與《唐宋分門名賢詩話》也是同書而異名。其理由是今存《唐宋分門名賢詩話》中與《古今詩話》相同的條目多達近二百條，占近二分之一；參張伯偉（編）：《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前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然《古今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中「山谷詩」一條既引及《名賢詩話》，則二書似還不能視為一書。

85 參見郭紹虞：《宋詩話考》，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95。然郭先生在此書同卷中，又另列《分門詩話》一條，以為與《唐宋分門名賢詩話》為二書，則不確。

孝宗弘治四，1491）年在尚州得以刊行，其中的前十卷至今仍相當完整地保存在韓國。<sup>86</sup>韓國忠南大學校趙鐘業教授曾撰文介紹，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分類彙編的詩話，《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等受其影響甚大，故在詩話史上的開創意義不可忽視。<sup>87</sup>是書分「品藻」、「鑒誡」、「譏諷」等三十四門，皆采自唐宋人所撰筆記、詩話等，雖然這些材料現在大多傳世，但仍有其校勘價值。

其次，宋人詩話傳入域外後多經翻刻，而這些翻刻本往往也有一定的文獻價值。比如釋惠洪《冷齋夜話》十卷，有《稗海》、《津逮秘書》、《學津討源》等多種版本，然最好的版本卻不能不推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五山版書多據中國宋元版覆刻，是書也不例外，乃據宋本覆刻，不僅文字很少脫誤，而且也較為準確。<sup>88</sup>再如，日本寬文版《天廚禁臠》、朝鮮本《詩人玉屑》、《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等，也都可資校勘。

大致說來，域外文學的思潮和風尚總是隨著中國本土文學風尚的變化而起伏波動的，只是在時間上較中土滯後而已。比如蘇軾詩在北宋中期至南宋初都甚為流行，而高麗中期以後至朝鮮初，東國詩壇也盛行蘇詩。高麗李仁老曾記權迪詩，慨歎：「蘇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為灰燼，落落雄名安可焚？」<sup>89</sup>朝鮮初徐居正撰《東人詩話》也有「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的記載。<sup>90</sup>明代中期，復古思潮日趨盛行，朝鮮宣祖朝以後也漸尚唐詩，所以朝鮮李植評論當時的詩壇風氣是：「先學古詩、唐詩，歸宿于杜，乃是《三百篇》、《楚辭》正脈，故

86 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附錄》（肅藝：太學社，1996年）和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皆收入此書。據是書後所存仲鈞跋語，刊印時稍有缺簡。

87 參見趙鐘業：〈宋代最早之分門詩話總集——《唐宋分門名賢詩話》〉，《中國書目季刊》，第15卷，第3期（1981年）；《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87。

88 參見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前言》。又，日本江戶時代釋道忠還撰有《冷齋夜話考》，對書中詞語和典故等有簡要注釋，收於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89 〔高麗〕李仁老：《破閑集》，卷下，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90 徐居正：《東人詩話》。

始為定論。」<sup>91</sup>日本平安後期、五山以至江戶時期，其詩學理論和批評的趨向，也大致走過麗、鮮兩朝的路子，先由學白居易轉而學杜甫，學蘇、黃，繼則受明人影響，提倡復古，崇尚唐音，最後重又趨歸於宋。日人久保善教曾描述這種情況是：「我邦始唱詩者，天智帝時，以大友、大津二皇子為祖師矣，而其詩專取法於宋。至延天之際，宋詩盛行，《瀛奎律髓》、《聯珠詩格》，幾於家有其書矣。實可謂文治之世。〔……〕及元祿之際錦裏先生者出，始唱唐詩，風靡一世。然其所奉書，僅止於《滄浪詩話》、《品匯》、《正聲》、滄溟偽《唐詩選》、胡氏《詩藪》而已。〔……〕近世關左詩人，始悟其風之偽，極口而痛駁之，而見宋詩之精神，遂醒詩家迷醉，海內為之。」<sup>92</sup>不過，這裏我們還應當指出一點，除了來自中國本土文學思潮的影響之外，程朱理學自高麗朝和平安朝傳入東國和日本以後，亦始終影響著文壇的理論和批評，並未因中土文壇的風氣變化而有太大的變化。當然，無論是朝鮮還是日本的文論和批評，也都各有其顯著的特點，並非一味模仿中土。

文學理論和觀念的形成，往往與知識和思想學術的背景有密切的聯繫，背景不同，對文學理論上的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會有差異。比如，北宋歐陽修論梅堯臣詩，曾明確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觀點。曰：「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sup>93</sup>就歐

---

91 〔朝鮮〕李植：《學詩准的》，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92 久保善教：《木石園詩話》，收於趙鐘業（編）《日本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2年）。

93 〔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收於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716卷（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此說當然並非歐陽修的發明。唐代的韓愈就曾說過「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話（〈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而若再往上追溯，宋玉說的「貧士失職而志不平」（《九辯》），司馬遷說的發憤而著書（參〈太史公自序〉），桓譚說的「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新論》）等，似早已有意無意地包含了這層意思。

陽修所論本身來看，此說是有為而發的，但同時它也揭示了一個逆境往往更能成就一位作家的普遍道理。後人對此幾無異議，然朝鮮士人卻多以為歐陽修之說既是有激而雲，則無論是「窮者而後工」還是其反命題「詩能窮人」，就都不妥當。如車天輅以為詩之「工拙，才也；窮達，命也。才者在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之在天，而窮達之數，夫豈人力也哉？」「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窮者自窮，達者自達」。<sup>94</sup>金錫胄等人則從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角度，認為達者之達，不過「達於一時，其窮也窮於萬世；此之窮，窮於一時，其達也達於萬世」。<sup>95</sup>「若其所傳乎遠者，怨仇不敢議其短，君相不能奪其譽，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殘膏剩馥，足以沾丐百代。」<sup>96</sup>李德壽又以為，「詩之工不工，系乎才，不系乎位，豈必窮之盡才，而通之盡不才乎？」故「非天之窮其詩也，窮其才也；非窮乎古也，窮乎今也。」<sup>97</sup>這些看法今人雖未必都會贊同，然而其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式，卻可以提供我們研究作家的創作與生存環境之關係問題時的參考。又如宋人評詩，多倡平淡，而日本五山詩僧虎關師煉則認為：「夫詩之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適理而已。〔……〕達人君子，隨時諷喻，使複性情，豈樸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適而已。」<sup>98</sup>也不失為有識之見。

在對宋代文學的總體認識上，域外士人的看法也有其獨特之處。像對宋詩的評價，後人常受時代思潮影響，將其與唐詩比較，未免任意軒輊，而一些域外士人的看法反比中國明清時代的很多論者要客觀全面、通達平正。如朝鮮金昌協（1651-1708）《農岩集》卷三十四《雜識·外篇》有云：「宋人之詩，以故實議論為主。此詩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也。然其自為也，未必

94 〔朝鮮〕車天輅：《五山集》，第5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6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1年）。

95 〔朝鮮〕金錫胄：《詩能窮人賦》，《息庵遺稿·別稿》，卷上，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45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5年）。

96 〔朝鮮〕張維：《溪穀集》，第3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9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2年）。

97 〔朝鮮〕李德壽：《西堂私載》，第4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86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年）。

98 虎關師煉：《詩話》，《濟北集》，第11卷，收於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第1卷，（京都：思文閣，1973年）。

勝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雖主故實議論，然其問學之所蓄積，志意之所蘊結，感激觸發，噴薄輸寫，不為格調所拘，不為塗轍所窘，故其氣象豪蕩淋漓，時有近於天機之發，而讀之猶可見其性情之真也。」以真率自然論宋詩，而不只是見其故實議論，就較公允。再如，日人長野確（1783-1837）也認為：「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而唐宋諸家各有悟入自得處，都不一般。如韓柳歐蘇王曾之文，歐虞顏柳蔡米蘇黃之書，莫不皆然也。」<sup>99</sup>「明人務求勝宋人，然其學術文章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為一家，不肯踏襲前人，明人好剽竊古人，是其膽識已迥然不同也。」<sup>100</sup>又，域外士子論宋代詩人，往往能兼及諸家諸派，表現出一種宏通的態度；他們或鍾情於某一家，又能獨具隻眼。如朝鮮洪奭周（1774-1842）論宋詩，於梅堯臣、歐陽修、蘇軾、江西詩派之外，同時舉出陸游、朱熹、文天祥、謝翱等人。<sup>101</sup>南龍翼（1628-1692）推陳與義詩為宋人最優者，<sup>102</sup>申靖夏盛讚蘇洵詩「雄傑渾深，非二子之比」，<sup>103</sup>李圭景則以為「范石湖，宋詩中可以模楷者」。<sup>104</sup>都是其例。

至如在一些具體的文學批評中，域外士人所論的可取之處就更多了。像高麗李仁老（1152-1220）論蘇、黃學李商隱，作詩多用事，「而造語益工，了無斧鑿之痕，可謂青于藍矣」。<sup>105</sup>李奎報（1168-1241）論梅堯臣詩曰：「余昔讀梅聖俞詩，私心竊薄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茶弱，中含骨鯁，真詩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sup>106</sup>朝鮮

99 長野確：《松蔭快談》，第3卷，收於趙鐘業（編）《日本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2年）。

100 前揭書，第2卷。

101 參見〔朝鮮〕洪奭周：《讀宋詩》，《淵泉集》，第1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93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2年）。

102 南龍翼：《壺谷詩話·詩評》，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103 申靖夏：《恕庵詩評》，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104 〔朝鮮〕李圭景：《詩家點燈》，第9卷，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105 〔高麗〕李仁老：《破閑集》，卷下。

106 〔高麗〕李奎報：《論詩說》；《白雲小說》，收於趙鐘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金昌協比較陳與義、陸游與黃庭堅、陳師道詩，「黃之橫拗生硬，陳之瘦勁嚴苦，〔……〕與其學山谷、後山，無甯取簡齋、放翁，以其去詩道猶近爾。」<sup>107</sup>又拈出黃庭堅《遊百花洲節氏園》「三公未白髮，十輩乘朱輪」兩句，謂：「此蓋設言黑頭作相，家世燁赫，只教人好看，而要無益於吾身云爾。注者乃以三公為寇萊公、範文正、謝希深。此只見百花洲有三公舊跡而附會如此，大失作者本意。」<sup>108</sup>日本菊池桐孫（1772-1855）論學黃庭堅和楊萬里，稱時人「喜黃者絕少，喜楊者常多，蓋黃詩奧峭耳，苦艱澀；楊時尖新，易入心脾故也。人但知學黃者墮魔障，而不知學楊者亦墮魔障矣。不善學之禍，楊恐過於黃。」<sup>109</sup>長野確謂：「王荊公作文，繁簡皆妙。如《上仁宗萬言書》，最繁而最美者；如《讀柳宗元傳》、《讀孟嘗君傳》，至簡而至美者。」「婉曲周折，法度閒暇，詞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募，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sup>110</sup>其他如成海應提出「《辨奸論》非老泉文，乃東坡所作也」，<sup>111</sup>申維翰《三家狐白評》遍評歐、王、蘇三家詩文等等<sup>112</sup>，都可參考。

二十世紀以前，漢字是東亞、東南亞各國的通用文字，尤其是在正式場合和士人的撰述活動中，大都離不開漢字的媒介。所以，在許多域外士人以漢語言文字撰寫的著作特別是史學著述中，往往也會給我們提供一些宋代文學研究方面的參考材料。例如，據朝鮮初期鄭麟趾等所撰《高麗史》卷七十《樂志》一載，高麗睿宗九（宋徽宗政和四，1114）年，宋徽宗賜給高麗「新樂」和《曲譜》十冊、《指訣圖》十冊。十一年，宋徽宗又賜給高麗「大晟雅樂」。所謂「新樂」和「大晟雅樂」，實際上指的都是宋徽宗崇寧

107 〔朝鮮〕金昌協：《雜識·外篇》，《農巖集》，第34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6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

108 前揭書。

109 菊池桐孫：《五山堂詩話》，第1卷，收於趙鐘業（編）《日本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2年）。

110 長野確：《松蔭快談》，第2卷。

111 成海應：《題蘇老泉〈辨奸論〉後》，《研經齋全集·續集》，第11冊，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7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1年）。

112 〔朝鮮〕申維翰：《青泉集·續集》，第9卷，收於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0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年）。

三年由魏漢津主持改定、崇寧四年完成並經宋徽宗賜名「大晟」、頒佈海內的雅樂。<sup>113</sup>所不同的只是第一次所賜主要是「新樂」的樂器、《曲譜》和《指訣圖》等，第二次則除了樂器之外，還有文、武舞儀仗和服飾等。《樂志》中的這些記載無疑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瞭解宋代的雅樂，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此外，歷來為人們所重視的是，《高麗史》卷七十一《樂志》二中還保存了宋徽宗改定樂制之前傳入高麗的「唐樂」，即隋唐北宋以來的燕樂或教坊俗樂，包括燕樂使用的樂器、歌舞大曲演奏人員、演奏儀式、口號致語、大曲曲詞七套三十首和雜曲曲詞四十四首。不但具體描述和生動展現了北宋歌舞大曲演出的實際情形，而且也為後人提供了宋代詞曲研究的重要文獻。清代康熙年間編《欽定詞譜》，對此已加以利用，並從中摘錄出中土已佚的二十三個詞調，七套大曲曲詞。王國維先生撰《唐宋大曲考》，曾據以增補了「惜奴嬌〔曲破〕」等一些中土載籍未備的曲調。唐圭璋先生編纂《全宋詞》，則將其作為無名氏之作全部收入。另，〈憶吹簫慢〉等四十四首雜曲曲詞，除了可考知主名為柳永等人的十五首之外，亦全部收入《全宋詞》。

再如，朝鮮正祖曾組織編纂過《宋史筌》一百四十八卷，他之所以編撰此書，其深層的原因是基於朝鮮時期已普遍形成的對宋代思想文化的民族一心理認同。正祖曰：「國家治教政法，忠厚寬仁，列聖相承，化理郅隆，綏猷垂謨，至善盡美，重熙累洽，悠久無疆，有非曆古之所能克媲。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與夫儒術之賅性理，士習之重名節，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則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則莫於史。」而「自遷《記》固《書》，代各有史，獨宋史之纂于元臣阿魯圖脫脫者，潦率無據，體裁則乖謬，輯敘則舛雜」。遂「積數十年，經數十臣，再三確例」，撰為此書。<sup>114</sup>

113 《音樂志》，《宋史》，第129卷，四載宋徽宗崇寧四年九月以新樂成下詔曰：「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朝鮮〕鄭麟趾等：《樂志》，《高麗史》，第70卷，一載高麗睿宗九年六月宋徽宗賜新樂詔亦云：「乃詔有司，以身為度，由度鑄鼎，作樂薦之，天地宗廟，羽物時應。」（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

114 正祖手諭，見《宋史筌》卷首，奎章閣藏本。

陳寅恪先生有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sup>115</sup>得此宜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宋史筌·文苑傳》較之《宋史·文苑傳》，有不少調整。閣臣除了將原屬《儒林傳》的高弁、劉顏、李覲、王回、楊萬里、何涉、鄭樵、徐夢莘、程大昌、王應麟、胡旦等十六人列入《文苑傳》之外，還列入了其他列傳中的王禹偁、胥偃、陸游、沈括、李燾、楊億、劉筠等九人，而將和峴、楊傑、劉詵、趙蕃四人改入《儒林傳》。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閣臣對《文苑傳》中人物所作的重新編排。《御定宋史筌義例》曰：「宋之道學，至周程張朱始大明；文章至歐蘇王曾始丕變。蓋國初文體猶襲五代之對偶聲律，其變以為古文，實自柳開、穆修輩倡之也，宜有以表章，而舊史〔指《宋史》〕之序列無類，去就未當。故今自柳開至陸遊，編之於首，以別古文之源流；自樂史至王應麟，以著述為次；自楊億至汪藻，以制詞為次；自李度至朱敦儒，以詩次之；自高頤至張即之，以翰藝次之；自徐鉉至刁，以南唐人次之；自許洞至夏侯嘉正，皆有才無命者也。」從這個編排的次序和細目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如下幾點：一、重視古文的創作，較準確地描述了古文發展的歷史，並在突出歐蘇王曾等人古文創和地位的同時，列入了許多往往易於被人忽略或一般看來並不以古文名世的作家（如尹源、蘇舜元、李覲、王回、李格非、王禹偁、黃庭堅、秦觀、張耒、唐庚、楊萬里、陸游、程俱等）。二、將許多史學家列入《文苑傳》，且地位僅次於古文。可見其「文」的觀念較為寬泛。三、推重宋四六文的創作。朝鮮時期，出於科舉和實際政治、社會生活的需要，士人往往都比較重視對四六文的學習。這裏閣臣首列楊億、劉筠、宋白等人，以熊克、汪藻結束，從而可更進一步看出，在四六文的創作上，東人是比較偏於對偶切當、用事工穩一派的。四、在《文苑傳》的最後，列許洞、孫唐卿、倪濤、夏侯嘉正等六人，稱其為「有才無命」，雖似分類標準不一，然由此卻又表現出閣臣對文學創作與士人遭際、社會背景關係的注意，與朝鮮時期「詩能窮人」的討論正可相參。總之，這些看法，應當說都是代表了朝鮮士人對宋代文學的普遍認識的，值得重視。

---

115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77。

綜上所述，現存於韓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中有關宋代文學的史料內容豐富，種類繁多，中如：（一）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二）上述撰述的朝鮮本、和刻本；（三）域外士人所編撰的宋集的注本、選本；（四）詩話、文集、史傳、筆記等文獻中的有關宋代文學研究的材料，都有值得我們關注和用作參考的地方。這一部份文學史料，理應成為我們整個宋代文學乃至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這是宋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地，可以相信，它也是一個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期待的領域。